

『硕果仅存』的历史功绩

陕甘革命根据地

丁德科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由并存到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其历史功绩，值得研究珍视。

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

“九二六”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出：“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一方应积极的培养我们的军队，一方更应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省委领导、地方党组织谋划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重大武装斗争。1927年10月爆发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渭华起义是陕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正式成立，统一领导陕北各地党组织，共青团陕北特委随即成立。1933年3月8日，为了加强党对创建军队和苏区的领导，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创建、扩大和发展照金、南梁先后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壮大陕北游击队以至红二十七军，创建、扩大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1935年2月5日召开的“周家硷会议”及有关会议决策，统一领导指挥红军及游击队，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使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更为统一、更为强大，取得了更大发展。

红军队伍日趋壮大，保卫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

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历经艰辛，于1931年9月中旬建成南梁游击队，迎来陕北游击队会师南梁。按照省委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并向关中发展，成立中共队委，两支队伍1932年1月初合并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同时成立。为了进一步整肃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共队委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于1932年12月24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1933年11月初的包家寨子会议，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南梁寨子湾会议，根据军事和根据地发展形势，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陕北，中共延川特别区委1932年3月12日领导发动的淮宁起义，是陕北地区进一步建立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节点。淮宁起义队伍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1932年4月18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932年10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4月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两次南下作战，北返途中被敌打散，至1934年1月恢复重建。中共陕北特委根据1933年7月的高起家圪扩

大会议决策，加快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7月8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加快组建了3个红军正规团，并在1935年1月30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1935年2月5日召开的“周家硷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及游击队。会议选举产生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5月初，两军主力会师，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组成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陕甘根据地共有40多支约3000人的游击队力量，农民赤卫军遍及区县。

苏维埃政权奠定群众基础，发挥对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基础支撑作用

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强调，“党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并明确省委下辖县（市）委8个、区委10个、支部153个、特支32个。

寺村塬红色政权是陕甘游击队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尝试，表明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明确认识，进一步总结了革命武装是革命政权必要保障的经验教训。照金苏区的开辟，红二团的成立，保卫、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发展。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后由秦武山接任），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成立青年团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兼任书记。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农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军委会党团书记。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革命根据地政权切实开展土地革命，实施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切实有效举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反动政府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寺庙的土地，按照土地政策和各村实际明确标准与办法，分地给没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红军及游击队更为壮大，更大范围开展土地革命，并且解决了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问题。陕甘边根据地积极开展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廉政建设，发展苏区经济社会事业，使根据地建设与拥军优属工作比较切实深入地进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先建立县级政权，再建立全根据地政权，是一个由下而上、由点向面的进程。各县在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组织、共青团和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土地革命集中在1934年底到1935年初普遍展开。

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土地改革运

动，以及根据地建设工作，充分彻底地调动了贫苦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切实地密切了党和红军、革命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艰辛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九二六”会议把坚决切实贯彻中央决策、领导群众创建政权提到了政治高度。会议强调，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并提出了“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武装农民”等明确的口号。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积极推动农村革命斗争掀起高潮。多次起义、兵变失败使党组织和领导人认识到根据地的至关重要，认识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至关重要。在有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陕甘地区的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中选择了国民党当局统治比较薄弱的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坚持创建发展革命武装与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日趋扩大发展，最终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培养军队、培植军事基础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中共陕西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由刘志丹创建的南梁游击队开始，武装力量发展历经多次整编，形成了统一领导指挥红军及游击队的大格局。

苏维埃政权对党和红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陈家坡会议于1933年8月召开，省委与根据地领导等多数人的意见，形成会议的正确决策，保证了红二十六军的统一指挥行动，坚决地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陕北革命根据地，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由于政权组织日趋健全坚实、体制机制日趋协调统一、执政方略举措日趋切实有效，对主力红军生存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根据地注重廉政建设，一切党政干部，从穿衣吃饭到笔墨纸张等用品，均按最低需要发给。犯了错误都要给予相应处分。特别规定，如有贪污10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予以严厉警示。

贯穿陕甘革命历史的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2月14日视察照金时讲的：“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在照金落脚，就是因为群众基础好，他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这里的群众能够支持革命。现在我们要依靠群众，要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如果能做到这些话，我们的事业就固若金汤了。”

（摘自2019年第10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陕甘边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陈 红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创建的红色区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标志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边区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廉政建设，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甘边根据地十分注重廉政制度建设。根据地初创时期，群众对红军不了解，躲避红军。为此，习仲勋明确要求：“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们，你们不要怕。”这样一来，群众逐渐对红军留下了好印象。

为了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陕甘边根据地在军队内部也建立了保证官兵廉洁的制度。红二十六军制定的《暂行条令十八条》，在廉政建设方面规定：“缴

晓天下

渭华起义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

李东朋

渭华起义熔铸的“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一、坚守信仰。渭华起义是在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异常严酷的形势下发起的。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陕西省委领导下，革命先辈们毅然决策和实施了武装起义。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坚定信念，是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人生观。

二、军民协同。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的结合，这是我们党在八七会议后反复强调的方针。渭华起义很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决定，是军民紧密结合的典范。坚持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军民团结战斗，是渭华起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渭华起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反映了我们党开展武装

斗争的要求和方向，意义重大。

三、探索创新。渭华起义，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革命的，许多问题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的。渭华起义是西北地区首次军民相结合的武装起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创新；在西北工农革命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开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之先河，这还是一个创新；明确提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方案，并做出10条具体规定，具有超越性，这又是一个创新。

四、勇于担当。尽管渭华起义还存在筹备时间短和领导人履职时间短、开展军事斗争经验不足等情况，但是决策者和人民群众毅然挑起重担，领导和发动了起义，充分表现出敢于担当的精神，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摘自2018年5月16日《陕西日报》）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歌颂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带来革命大转折的歌曲。1935年9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次日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此前，1934年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担任主席；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点。然而，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当时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人都被作为“敌人”关押，差点被活埋。就在这生死关头，中央派董必武等对刘志丹、习仲勋等进行审查，下达了“刀下留人”的命令，此后，为他们彻底平反。这首歌，生动地再现了那段历史，歌颂了像山丹丹那样热烈地坚定革命信念的先烈们。

从“山蛋蛋”到“山丹丹”

1971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老同志建议，整理几首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民歌，并进行加工创作。这一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决定由中央文化组组织创作力量完成几首革命历史歌曲，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是年5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组长王敬之和编辑王惊涛来到陕西，同徐锁、李若冰、关鹤岩、冯福宽等人组成了工作小组到延安采风。在延安第一招待所，大家整理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

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诞生记

夏涸洲

写出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历史意义，并由乌云想到雷声，在“千里的雷声万里闪，咱们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气象中，就差点题之句了。

一片片山丹丹，花开花落，装点苍凉的高原，让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人们还能看到美好的景色。触景生情，刘烽忆起他在陕北采风时所得：“山蛋蛋开花背洼里红，有那些心思你搁在心中。”方言中的“山蛋蛋”说的就是野百合，野百合下面不是有个圆圆的百合吗？就叫山蛋蛋。因此，他提出用“山丹丹开花”起兴，关鹤岩补补一句“红艳艳”，既押韵又朗朗上口。歌曲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语言和最古老的比兴手法，在曲首点出了中央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陕北的这一历史事件，奠定了全曲的基调。又在最后用了一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直抒胸臆地传达出了内心的那份情感。

影响遍及大江南北的“山丹丹”

领唱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信天游”风格的歌曲。刘烽在音乐创作时，充分挖掘古老的陕北民歌的浪漫风韵。作品前奏开始在一个自由节拍的散板，音调具有浓郁的陕北民间音乐风格特征。接着是歌曲的第一部分，整体旋律张弛有度、疏密有致，富于变化，节奏感强。主题旋律与靖边民歌《咱陕北人跟的是刘志丹》最为接近，风格悠长而抒情，特别是“咱们”二字采取同音反复和“弱拍起唱”手法，既有语感，又使这段音乐显得十分紧凑，显露出一种内在的急切之情。一段间奏之后，歌曲进入中间部分。间奏用了《白灵子过河》的主干音。中间部分音调则来自陇东民歌《十八姐担水》。音乐是一个热烈的快板，表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欢乐情绪。当唱到“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时，速度放慢，演唱一字一音，刻画了坚定有力、众志成城的革命精神。在“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一句中，“毛”字音高为全曲中第二高的音，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突出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历史意义。最后，音乐完整再现了第一部分。全曲高潮句是“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突出运用了陕西民间音乐特有的“苦音”调式，热辣酸心的演绎，是人民朴素情感的外显。在作曲上，将九字句分成三截：“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形成富有传统戏曲唱腔特点的尾声，音乐滔滔，一泻千里，气贯长虹，酣畅淋漓。

1971年底，歌曲创作完成后，陕西省歌舞剧院演员杨巧担任首次领唱，同年12月25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影响遍及大江南北。1972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包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内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署名为“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第一集《战地新歌》收录了全部五首“革命历史民歌”。后来，中国唱片社灌录了同名密纹唱片，西安电影制片厂还专门为此拍摄了纪录片。

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干扰下，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被作为“敌人”关押，陕甘苏区一时阴云笼罩，危机重重。

事实上，在徐海东与习仲勋会师一个月零四天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就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安定。在瓦窑堡，毛泽东看到陕北苏区是我党保存最好的一块根据地，却因肃反陷入最严重的困境。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央派董必武等五人小组对刘志丹、习仲勋进行审查，下达“刀下留人”并尽快解决问题的命令。事后，习仲勋感慨地说，要是中央红军晚来四五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正是由于“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才救下了刘志丹、习仲勋和马文瑞等原陕甘根据地领导人。11月下旬，中央给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的决定在根据地深得人心，正像歌曲所唱的，“满天乌云风消散”。毛泽东“刀下留人”挽救了红军，挽救了苏区。陕北红军拿出最好的油馍馍等招待中央红军，并在中央红军的协助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正是以这段革命历程为背景，深情歌唱“毛主席来了晴了天”的主题思想，实现了时代特有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

（摘自2019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永远的“山丹丹”——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诞生记》）

忆往事